

臺灣漢學四十年

——裂變與跨界的思想史研究**

呂 妙 芬*

摘 要

本文主要回顧臺灣史學界過去四十年間研究中國思想史的情形。論文首先就臺灣高等教育制度與課程的變化，以及博士論文選題等資料，說明近年思想史研究的興衰消長。接著，分別以人物思想與時代思潮為主的研究，社會史和文化史興起下的思想史研究，概念史、詞彙史與翻譯研究，東亞儒學與全球思想史等，說明過去四十年間思想史研究的變化趨勢。

關鍵詞：思想史、概念史、文化史、東亞儒學、全球思想史

* 呂妙芬，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兼所長。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歷史博士，曾任美國哈佛燕京學社、普林斯頓高等研究院（IAS）訪問學者，並曾榮獲中央研究院年輕學者著作獎、中研院人文及社會科學學術性專書獎、科技部傑出研究獎。專長領域為明清思想文化史。著有《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成聖與家庭人倫：宗教對話脈絡下的明清之際儒學》等書。

呂教授現為漢學研究中心指導委員，並為本中心籌辦中的「性別化的變遷：女性主義知識生產與跨國行動參與」國際研討會籌備委員，亦曾擔任本中心「外籍學人來臺研究漢學獎助」審查委員。有多篇大作刊登於《漢學研究》和《漢學研究通訊》等刊物。

** 本文承助理黃文信先生協助蒐集並整理資料，特此感謝。

一、前言

如果我們不要說「一切的歷史都是思想史」，而是檢視臺灣近 40 年來研究中國知識菁英之思想或漢語思想文本的學術發展，我想所有人都會同意這是一個明顯由盛轉衰的領域，同時也是一個裂變、跨界而創新的領域。1980 年代是臺灣中國思想史研究的高峰，國內有錢穆（1895-1990）、牟宗三（1909-1995）等大學者講學不輟，旅居國外的余英時、林毓生等著名學者也回國講學，新一代留美年輕學者如黃進興、陳弱水、王汎森等已嶄露頭角，中國思想史研究一片榮景。就我個人的經歷而言，我是 1980 年代在臺大中文系就讀大學和碩士班，當時中文系、歷史系、哲學系同時開設「中國思想史」和「中國哲學史」課程（分別由三位老師授課）。¹ 同屆碩士班同學共 10 人，其中有 7 人選擇研究經學、子學和明清學術思想。我雖沒趕上余英時、林毓生回臺講學的熱潮，但猶記得 1988 年杜維明到臺大講學，文學院會議室擠滿人潮的盛況，² 以及錢新祖（1940-1996）在第一堂課提供全學期課程大綱、指定英文閱讀書目，老師和學生認真上課的場景。³ 這些是我記憶中臺灣學界研究中國思想史的高峰期。

由於本文回顧的領域是「臺灣漢學研究的思想史」，本書中另有專章討論經學、宋明理學，因此本文將集中討論史學界研究「中國（漢語）思想史」的情形。以下我將先就臺灣高等教育制度與課程的變化，以及博士論文選題等資料，說明近年思想史研究的興衰消長，接著說明過去 40 年間思想史研究趨勢的變化。

1 當時臺灣大學中文系「中國思想史」、哲學系「中國哲學史」均為必修，歷史系則是選修。歷史系除早年曾以「中國政治思想史」、「中國近代思想史」為必修，後來的思想史課程都是選修。臺大中文系 1949-1964 以「中國哲學史」為必修，1964 年課程名稱改為「中國思想史」，從 1964 年迄今仍維持必修。關於中國思想史課程源流、各大學「中國思想史」的內容與使用教科書等情形，參見李宗定，〈「中國思想史」課程源流考察——兼論中文系「中國思想史」的教材〉，《興大中文學報》46（2019.12）：175-211。

2 杜維明，《現代精神與儒家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5），頁 i-iv。

3 錢新祖的遺稿中有中國思想史的講義，由臺大出版中心於 2013 年以《中國思想史講義》為題出版，是為錢新祖集的第一卷；錢新祖上課對於學生的震撼力，可見該書編者所撰前言，見《中國思想史講義》（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3），頁 vii。

二、由盛而衰的中國思想史研究

過去 40 年間，臺灣高等教育歷經極大的變化，1990 年代一連串的教育改革措施，包括廣設大學、增加大學生與研究生員額，歷史學的研究生人數也大幅增加。以國內畢業的歷史博士人數而言，1980-2020 年間全國共培養 836 位史學博士；前 20 年有 207 人，後 20 年有 629 人，後期人數約為前期的 3 倍。由於臺灣史研究所成立較晚，近 10 年才有博士畢業（共 17 人），若只計畢業於一般歷史所的博士總數則是 819 人。⁴

歷史學博士人才增加的同時，臺灣高教教師員額並沒有顯著的擴增，反而因為少子化與整體經濟因素，許多學校都限制教師員額增長。根據教育部統計處資料，近年全國歷史系所的教師數不但沒有增加，反而有下修的趨勢，從 101 學年度 277 人，降至 109 學年度 262 人；中央研究院歷史領域的研究人員總數近年也明顯縮減，從 1998 年的 118 人降至 95 人（2020 年）。⁵

表 1 全國各大學歷史系所暨臺灣史研究所專任教師人數

學年別	教授	副教授	助理教授	總數
101 學年	100	103	74	277
102 學年	107	95	69	271
103 學年	106	100	71	277
104 學年	105	97	63	265
105 學年	99	101	58	261
106 學年	100	111	57	268
107 學年	98	111	52	261
108 學年	95	110	58	263
109 學年	92	107	63	262

4 資料見本文表 2。

5 1997 年中研院歷史語言所的「語言組」分出成立語言所籌備處，故歷史語言所研究人員數在 1997-1998 年間有很大的落差，故此處以 1998-2020 年間中研院三個歷史所的研究人員數為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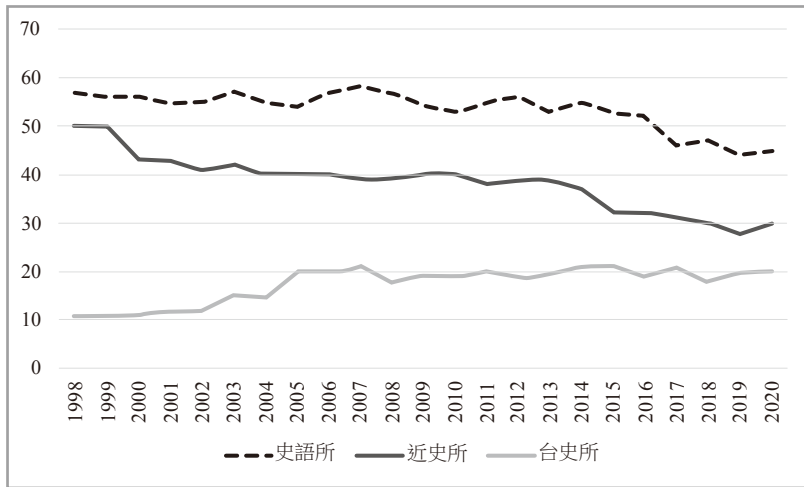


圖 1 中央研究院各歷史研究所專任研究人員總數

再看全國歷史系師生人數、生師比的變化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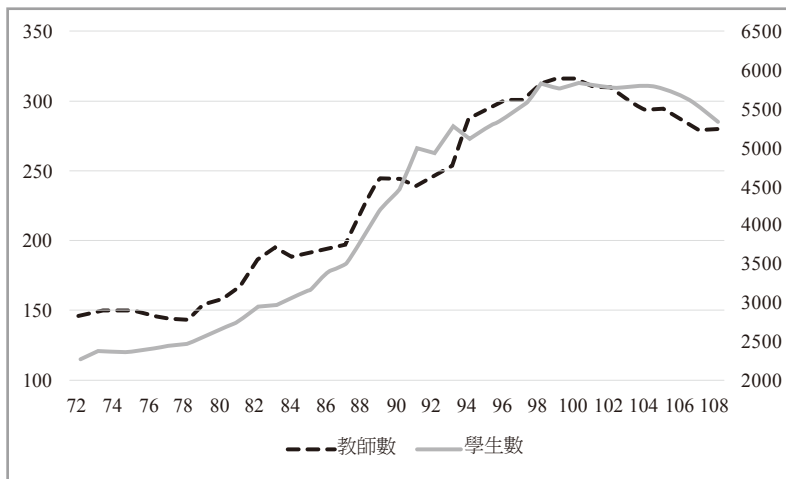


圖 2 各大學歷史系所 1983-2019 教師數與學生數
說明：1983-2019 即指 72-108 學年度，以下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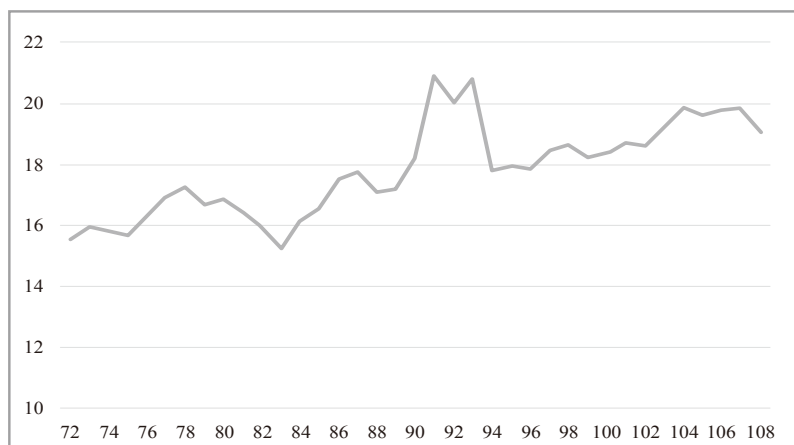


圖 3 各大學歷史系所 1983-2019 生師比變化趨勢

從上圖可見，臺灣在一連串教育改革之後，目前歷史系的生師比仍高達 19，甚至高於 1980 年代，這項重要指標顯示的退步意涵不容忽視。綜言之，近 20 年來雖然國內培育史學博士人才總數激增，但從事專業史學教研工作人員的總數，並未能同幅增長，加上社會上其他行業對於專業史學人才需求有限，這也是造成高教流浪博士問題的主因。

在高教環境劇烈變化的同時，國內歷史學教育也經歷重大的改革，從早期以中國史為主的教學與研究，轉向以臺灣自身的歷史為主，再往外擴展的同心圓學習歷程，歷史教育內容逐漸形成以臺灣史、中國史、東亞到世界史的三大領域區分。目前各大學歷史系聘用的師資也大致分為臺灣史、中國史、世界史三大領域，配合教育部推動雙主修、輔系、多元學習等方案，歷史系的課程朝著減少必修學分、強化選修課的方向調整。這些措施一方面讓歷史教育的內容更寬廣而多元，另一方面則著重培養學生的歷史思辨能力而非背誦，有其重要意義，也獲得許多師生的支持。不過，上述的變化對於傳統思想史研究領域卻也有負面影響，包括：中國思想史的專業人才銳減、培育專業人才的課程偏少、學生經典文本閱讀能力降低等。上述問題已相當明顯，從目前高教現場的情況看來，未來國內關於思想史研究的前景並不樂觀。

從國內大學歷史系開設中國思想史相關課程的變化，亦可見思想史由盛轉衰的情形。舉例而言，臺大歷史系開設的思想史、史學史、古典文獻選讀的課程數，在 1980-1990 年代每學年都能維持在 10 門課以上；近年則在 5-7

門之間。⁶全國各大學歷史系所開設與思想史、經典文獻相關的課程總數，隨著學生人數的增加確實曾經上升，近年來則大致持平，不過衡諸系所數量與學生人數增加的幅度，思想史課程弱化的趨勢是明顯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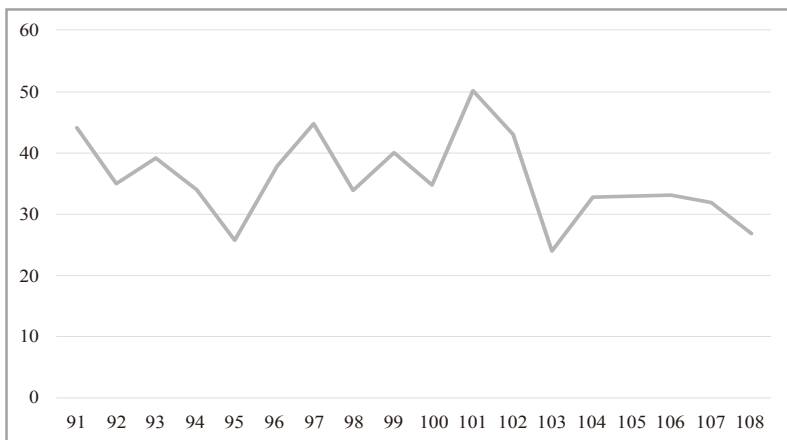


圖 4 全國各大學歷史系開設中國思想史課程數變化

讓我們再看過去 40 年間在國內完成的博士論文篇數與領域分布：（以下各圖表係依據國家圖書館「臺灣博碩士論文知識加值系統」資料整理）

表 2 1980-2019 國內史學博論總數、中國思想史領域博論篇數

年代（畢業年度）	中國思想史	史學總數	思想史比例
69-73	4	21	19%
74-78	9	35	26%
79-83	13	70	19%
84-88	10	81	12%
89-93	11	142	8%
94-98	14	160	9%
99-103	20	179	11%
104-108	11	131	8%
總計	92	819	11%

6 臺大歷史系歷年課程資料參照：<https://course.lib.ntu.edu.tw/?q=taxonomy/term/181>，檢索日期：2021/1/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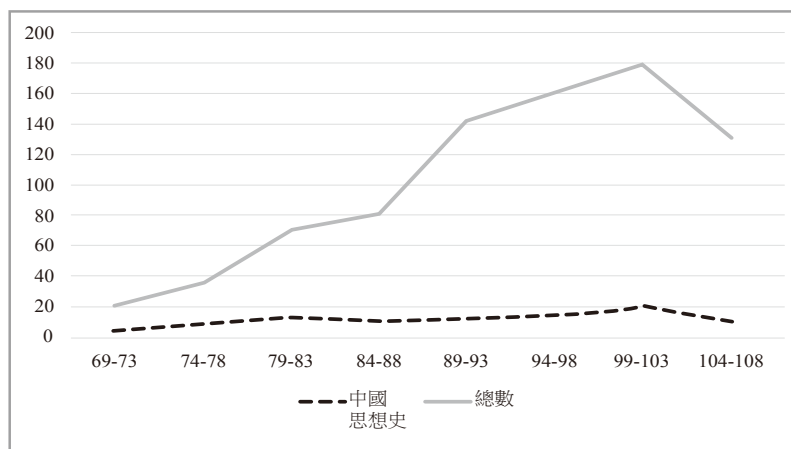


圖 5 國內史學博論總數、中國思想史領域博論篇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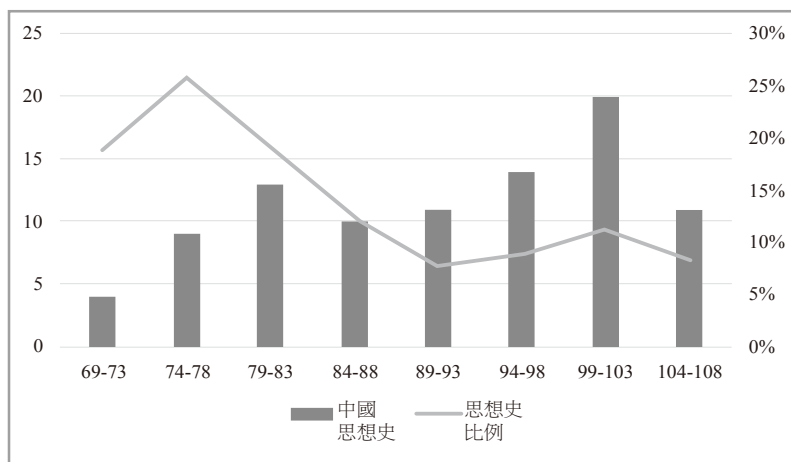


圖 6 國內中國思想史博論篇數佔博論總數之比例

從 1980 年代到 1990 年代初期，有不少韓國留學生在臺灣取得博士學位，其中許多人研究中國思想史，這些韓籍學生畢業後多返國就業。近年畢業的博士生中，有部分是在職進修生，其中許多為國高中教師，這些在職進修生在取得博士學位後多半留任原職，並未轉入高教或研究單位。根據上表資料，過去 40 年間中國思想史領域的博士論文共有 92 篇，平均占博論總數的 11%，其中以 2010-2014 年間數量最多（20 篇，占該時期博論總數 11%）。

若就中國思想史博論數在整體歷史學博論當中的占比而言，則明顯呈現下滑趨勢，1985-1989 年間比例曾高達 26%，近 20 年平均為 10%。

再進一步分析近 20 年內畢業的 46 位中國思想史領域博士目前的就業情況，其中 23 人專任於國內大學與研究機構，其他人則或到海外工作，或擔任兼任教師、博士後研究、高中教師，或離開學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專任教師中多數任職於通識中心、科技大學和中央研究院，僅少數任教於歷史系所，因此許多人未必能開設與自己專業相關的課程。換言之，國內近 20 年畢業之中國思想史領域的博士中，目前真正指導研究生者很少，故就專業研究的學術傳承與再生產而言，成效不佳。以上數據雖未計入於國外取得學位的教師，不過從上述的人才現況分析，已可預見此領域的專業人才在臺灣未來的斷層危機。

綜上所論，臺灣研究中國思想史曾經在 1980 年代達到高峰，當時海外著名學者回國講學、留學歸國的年輕學者中不乏思想史專業人才，國內史學博士中每 4-5 人就有 1 人從事中國思想史研究。這些博士中除了一些韓籍留學生返國服務外，幾乎全數投入國內教研機構，承擔研究與教學的工作。從 1990 年代後期開始，中國思想史領域呈現快速衰退的態勢，除了國內歷史學領域的大幅重整、知識和研究領域的擴展外，新文化史研究大興也是改變傳統史學領域分布的原因。近 20 年文化史的博論篇數約占總篇數的 27%~36%，是最熱門的領域。事實上，不僅思想史，傳統政治史、制度史、經濟史同樣面臨嚴重衰退的命運。

表 3 國內史學博論總數、文化史領域博論篇數

學年度	含臺史所			不含臺史所		
	總數	文化史	占比	總數	文化史	占比
69-73	21	2	10%	21	2	10%
74-78	35	3	9%	35	3	9%
79-83	70	11	16%	70	11	16%
84-88	81	17	21%	81	17	21%
89-93	142	39	27%	142	39	27%
94-98	160	58	36%	160	58	36%
99-103	185	53	29%	179	53	29%
104-108	142	42	30%	131	37	26%
總計	836	225		819	2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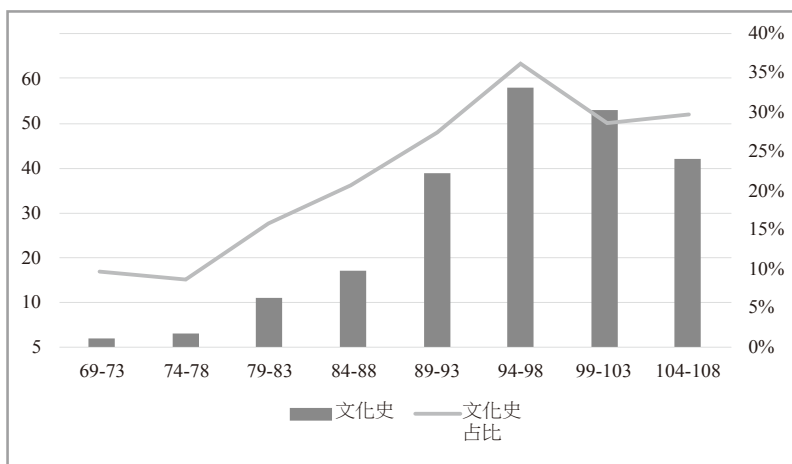


圖 7 國內文化史博論篇數暨其佔史學博論總數之比例

三、研究趨勢變化

本節嘗試說明近 40 年來，臺灣學界對於中國（漢語）思想史領域的研究趨勢變化。不同研究取徑之間雖非彼此取代的關係，而是並存的，但仍能看出趨勢的消長變化。早期思想史研究主要探討著名思想家的思想、分析重要文本或某時期的學風特色，後來在社會史、文化史的衝擊下，有許多新的嘗試，晚近則強調跨界與全球的視野。以下試著說明幾個明顯變化的趨勢。

（一）以人物思想、時代思潮為主的研究

1980 年代中國思想史研究一方面延續梁啟超（1873-1929）、胡適（1891-1962）、錢穆等人的工作，主要研究某一時期的思想特色、著名人物的思想內容，同時比以往更重視西學，逐漸引進西方理論與海外漢學研究的成果。當時錢穆、徐復觀（1904-1982）、牟宗三、唐君毅（1909-1978）的著作廣泛被閱讀；⁷ 錢穆的思想史論著也是在 1976-1980 年間結集成《中國學術思想史論

7 徐復觀著作繫年，見黎漢基的整理，<https://sites.google.com/a/xufuguan.net/academic/home/a>，檢索日期：2021/1/13；牟宗三著作繫年，見李明輝整理，<http://bbs.gsr.org.tw/cgi-bin/view.cgi?forum=27&topic=286>，檢索日期：2021/1/13。

叢》，由東大圖書出版公司出版。我們從 1980 年代國內思想史博士論文的選題可看出當時的普遍學風：「宋代儒釋調和論及排佛論之演進——王安石之融通儒釋及程朱學派之排佛反王」（蔣義斌，1983）、「梁啟超與儒家傳統」（劉紀曜，1984）、「阮元學術之研究」（劉德美，1985）、「葉適經世思想研究」（曹在松，1988）、「明末清初儒學之發展」（李紀祥，1989）等，主要都是研究著名思想家或時代思潮。事實上，1980 年代留美的黃進興、朱鴻林、陳弱水、王汎森等思想史家，他們的博士論文也主要研究人物思想，分別研究李紱（1673-1750）、丘濬（1421-1495）、柳宗元（773-819）、傅斯年（1896-1950）。⁸

從 1970 年代後期開始，一些旅居海外的思想史家回臺講學，並開始在臺灣出版他們的近作，帶出深遠的影響。不少人都曾談論到 1970 年代余英時的著作在臺灣出版後所引領的思想史研究熱潮：陳弱水認為余先生〈反智論與中國政治傳統〉一文在聯合報副刊連載後，引發很大的震動，奠定了余先生在臺灣知識界與人文學術的重要影響力和地位；王汎森說隨著余先生幾篇論文於 1970 年代後半陸續在臺出版後，「余先生的名字有如天上的巨星」，人們千方百計去找他早期出版的書來讀；林載爵也說《歷史與思想》收錄的文章開啓了中國思想史研究的新解釋和新視野，聯經年年重刷，影響深遠。⁹事實上，除了著作的影響力以外，余英時、林毓生等人對於培育臺灣下一代思想史家亦有重要貢獻，從《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與《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等書可以看到他們如何帶領一世代的優秀年輕人走向學術之路。¹⁰當時臺灣學子對於中國思想文化的熱情

8 Chin-shing Huang, "The Lu-Wang School in the Ch'ing Dynasty: Li Mu-t'ang"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1983); Hung-lam Chu, "Ch'iu Chün (1421-1495) and the 'Ta-hsüeh yen-i pu': Statecraft Thought in Fifteenth-Century China."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84); Jo-shui Chen, "The Dawn of Neo-Confucianism: Liu Tsung-yuan in the Intellectual Changes in T'ang China, 773-819" (PhD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1987); Fan-shen Wang, "Fu Ssu-nien (Sinian): An Intellectual Biography" (Ph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

9 林載爵主編，《如沐春風：余英時教授的為學與處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頁 3、10-11、259。

10 丘慧芬編，《自由主義與人文傳統：林毓生先生七秩壽慶論文集》（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5）。黃進興記載他與余英時先生的師生情緣，見黃進興，〈藥方只販古時丹：余英時

確實和現今不同，除了校園內的學習，愛新覺羅毓鋆（1906-2011）於奉元書院講授經書、錢穆在素書樓的講課，都吸引了眾多年輕學子，這樣的氛圍是讓思想史得以蓬勃發展的重要原因。¹¹ 林毓生曾說他 1974 年回臺講學，遇到一批奮發有為的學子，學生們對於思想問題的重視與好學，更鼓勵他認真思考、傾囊相授。¹²

1970-1980 年代有許多思想史名著出版：余英時《歷史與思想》（1976）、《論戴震與章學誠》（香港 1976，臺北 1980）、《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1987）；陸寶千《清代思想史》（1978）；林毓生《中國意識的危機：五四時期激烈的反傳統主義》（英文版 1979，簡體中文版 1986、繁體中文版 2020）、《思想與人物》（1983）；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1988）、《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1989）；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1983）、《康章合論》（1988）等。¹³ 上述著作多探討中國思想文化的內涵與特色、中國傳統文化在現代化過程中的演變與適用問題、中國近代危機中的知識分子，也觸及中西文化傳統的比較，並運用西方理論來輔助詮釋中國思想。此時期最熱門的議題是探討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中國傳統文化與民主、自由的關係，檢討五四新文化運動的意義，特別是 20 世紀中國知識分子激進化的思想傾向。這些有關中國近代巨大變局的研究，與學者們的生命經歷密切相關，他們也都懷抱強烈的現世關懷，有深刻的文化使命感，不僅藉學術研究探索中國思想文化與現代世界的關係，更有重建中國人文精神的宏願。

師門六年記》，<https://www.storm.mg/article/2212527?page=1>，檢索日期：2021/1/14。

- 11 黃忠天，〈溯源與奔流——跨世紀經學家愛新覺羅毓鋆與奉元書院教育〉，《漢學研究通訊》32.1（2013.2）：38-49。戴景賢曾述其隨錢穆先生讀書的情形，見 https://www.luoow.com/dc_tw/108521334，檢索日期：2021/2/17。
- 12 林毓生，《思想與人物》（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頁 1-2。
- 13 余英時，《歷史與思想》（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6）；《論戴震與章學誠：清代中期學術思想史研究》（臺北：華世出版公司，1980）；《中國思想傳統的現代詮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林毓生，《思想與人物》；Lin Yu-sheng, *The Crisis of Chinese Consciousness: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in the May Fourth Era* (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79)；張灝，《烈士精神與批判意識——譚嗣同思想的分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9）；汪榮祖，《晚清變法思想論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3）；《康章合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

臺灣從 1980 年代開始也積極引進西方學術成果、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¹⁴除了留學生赴海外學習，國外學者來臺交流也日益頻繁。美國漢學界如史華慈（Benjamin I. Schwartz, 1916-1999）的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追求富強：嚴復與西方》）、列文森（Joseph Richmond Levenson, 1920-1969）的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s: A Trilogy*（《儒教中國及其現代命運》）、狄百瑞（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1919-2017）的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中國的自由傳統》）、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的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擺脫困境：新儒學與中國政治文化的演進》）等思想史著作，都逐漸為國內學者所知。¹⁵

另外，1980 年代時報文化公司規劃出版「文化中國叢書」，以「中國現代化的歷程」、「中國現代化的前瞻」、「民主與中國」、「五四與中國」、「知識份子與中國」、「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中國文化的危機與展望」、「西方學者論中國」等主題，選編中外學者的學術著作再出版。其中「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共規劃 6 冊，分別以晚清思想、民族主義、自由主義、科學主義、保守主義、社會主義為主題，選編學者研究中國近代重要思想人物的論文再出版（實際出版 5 冊）。周陽山為這套叢書撰寫的總序中說這是針對「數十年來相關領域之研究成果作一總整理」，¹⁶其內容也反映了當時中國思想史研究

14 例如，漢學研究中心於 1984 年與國立清華大學合辦「中國思想史國際研討會」，有國內外專家學者 55 人參加，宣讀論文 15 篇。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於 1991 年與 UC Davis 合辦「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國際學術研討會」，共有 34 位國內外學者參加，會中中以中、英文發表論文。此會議論文集由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於 1992 年 6 月出版為《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文集》上、下冊。

15 Benjamin Schwartz, *In Search of Wealth and Power: Yen Fu and the West* (Cambridg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Joseph Levenson, *Confucian China and Its Modern Fate: A Trilog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5); Thomas Metzger, *Escape from Predicament: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a's Evolving Political Cultur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lliam Theodore de Bary, *The Liberal Tradition in China*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83).

16 「文化中國叢書」的編輯小組由朱雲漢、周陽山、彭懷恩、詹宏志、楊肅獻、鄒理民組成，關於此套叢書編輯的主旨參見周陽山撰寫的〈「文化中國叢書」總序〉，此序文附於叢書中每本書之卷首。「近代中國思想人物論」由時報出版公司於 1980 年出版 5 冊。

熱絡的情形。

以下將介紹 1990 年代以降思想史盛行的不同研究取徑，也會談到以人物為主題的研究明顯變少，但並非完全沒有。事實上，對於菁英知識分子與經典文本的研究仍是思想史最重要的工作。舉例而言，沙培德（Peter Zarrow）*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s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走出帝制：近代中國國家觀的轉型》）一書探討近代中國如何在兩代之間完成從傳統帝制皇權到現代國家的思想轉型，書中對於康有為（1858-1927）、梁啟超、嚴復、孫中山（1866-1925）、章太炎（1869-1936）、劉師培（1884-1919）等人的思想有深入討論；楊貞德《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主要以梁啟超、胡適、陳獨秀（1879-1942）、梁漱溟（1893-1988）等人的思想，探究中國近代思想史上關於個人、歷史與政治的不同主張，指出有明顯轉向個人自我的傾向；劉季倫《現代中國的思想與人物》探究王國維（1877-1927）、胡適、魯迅（1881-1936）、殷海光（1919-1969）、柏楊（1920-2008）、黃仁宇（1918-2000）等人的思想，及其所反映的時代問題；吳展良以系列論文深入地研究朱熹（1130-1200）的思想。¹⁷ 以上都是典型以人物思想為主的研究，但論述深刻，絲毫不減其學術分量。黃克武於 2020 年出版《顧孟餘的清高》也是一本人物評傳，此書以豐富的史料深入討論顧孟餘（1889-1972）的生平及其政治思想與抉擇，同樣深獲好評。¹⁸ 再者，即使是傳統的文本，換一個研究視角也可能開發出有意義的新研究，例如傅揚試圖擺脫現代經濟學的概念，考察《左傳》、《國語》等傳統經典文獻中的「經濟論述」，探討其與中國古代政治與禮樂傳統的關係。¹⁹

（二）社會史、文化史興起下的思想史研究

17 Peter Zarrow, *After Empire: The Conceptu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Chinese State, 1885-1924*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楊貞德，《轉向自我——近代中國政治思想上的個人》（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09）；劉季倫，《現代中國的思想與人物》（臺北：政大出版社，2014）。吳展良的著作，參見 <http://140.112.142.79/teacher/user-b.asp?teacher=wuwei>，檢索日期：2021/2/17。

18 黃克武，《顧孟餘的清高》（沙田：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20）。

19 傅揚，〈禮以制財——《左傳》、《國語》中的經濟論述〉，《臺大歷史學報》61 (2018.6): 243-288。

雖然臺灣在 1980 年代經歷了思想史研究的高峰，不過從西方史學風潮看，1950-1960 年代馬克思主義和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研究，無論是為庶民作史或書寫日常生活，或結合社會科學理論以詮釋歷史的方法，已嚴重衝擊了傳統菁英思想史研究。²⁰ 強調史學與社會科學結合的研究方法，在 1970 年代的臺灣也曾掀起史學方法的熱烈論辯，反映於《思與言》、《食貨月刊》等期刊論文中。²¹

韋伯（Max Weber, 1864-1920）等社會學理論在 1980 年代經高承恕、顧忠華等人的引介，開始在臺灣掀起熱潮。²² 加上當時東亞經濟的快速成長，一時間「儒家倫理」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成為熱門話題。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於 1987 年出版後立刻引起熱烈討論，此書選題既呼應當時熱門的論題，又奠基在史學界對於明清經濟與商業活動的研究成果之上，同時是一部視野宏觀的思想史作品。余先生受韋伯《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的精神》啟發，但以紮實的史料來探究中國儒、釋、道三家從中唐以後的入世的轉向，以及明清商人的思想、自我認同、新的士商關係等議題，同時也修正了韋伯對於中國宗教的斷言，是一本結合社會史與思想史的作品。²³

到了 1990 年代，結合社會史、制度史與思想史的研究取徑更為普遍。當時在北美的留學生中，不少人師從哈佛大學的包弼德（Peter Bol）與 UCLA 的艾爾曼（Benjamin A. Elman）。包弼德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20 Lynn Hunt ed., *The New Cultural Histo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9), pp. 1-22. 黃進興，〈蛻變中的「思想史」——一個史學觀點的考察〉，收入氏著，《歷史的轉向：現代史學的破與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21），頁 175-212。

21 黃俊傑，〈三十年來史學方法論研究的回顧與前瞻（1950-1980）〉，收入賴澤涵主編，《三十年來我國人文及社會科學之回顧與展望》（臺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 163-239；彭明輝，《臺灣史學的中國纏結》（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1），頁 113-120；王晴佳，《臺灣史學 50 年（1950-2000）：傳承、方法、趨向》（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頁 43-84。

22 關於高承恕與臺灣 1980 年代的韋伯熱，及其後來帶學生研讀法國年鑑學派的史學著作，並投入臺灣中小企業研究的過程，參見王振寰等編撰，《西方與東方：高承恕與臺灣社會學》（臺北：巨流圖書公司，2014）；2018 年顧忠華等社會學者舉辦「韋伯熱的回顧及其當代意義」座談會，錄影見 <https://youtu.be/82a3C7aZirk>，<https://youtu.be/DVSB2lxFOmU>，檢索日期：2021/2/17。

23 余英時，《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7）。

in *T'ang and Sung China* (《斯文：唐宋思想的轉型》) 探討唐宋士人文化與學術思想轉型，本書突破過去學科分際的慣例與書寫，是一部結合政治史、社會史、文學與道學思想的跨界作品。他也研究金華地方的士人文化、士人對地方的認同與社會參與、地方志書寫，以及地方與中央的關係。²⁴ 這個地方學術史的研究取徑吸引許多年輕學者跟進。他的學生李卓穎、陳雯怡、李宗翰都有地方學術史的研究著作。²⁵ 艾爾曼的成名作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從理學到樸學：晚期中華帝國知識與社會變革》) 出版於 1984 年，主要探討清代考證學得以在江南發展的社會與文化條件，是一部從社會文化角度考察學風變化的著作，此書在 1980 年代出版，給人耳目一新之感。他後來關於常州今文經學的研究，同樣結合了家族、科舉、政治等不同角度來研究思想史。²⁶ 艾爾曼教授 1980 年代後期以來多次在臺灣講學，他的研究取徑也頗受學界重視，學生楊瑞松研究顏元與清初北方儒學，筆者研究陽明學地方講會，都深受到老師的啟發。²⁷ 另外，當時日本學者「地域社會論」蔚為風潮，「華南學派」結合人類學田野調查與歷史研究的取徑日受重視，其主要影響雖在社會史領域，但他們的方法論與研究成果對於思想史亦有所啟發，提供研

24 Peter Bol, *This Culture of Ours: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T'ang and Sung China*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The Rise of Local History: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61, no.1 (2001): 37-76; "The 'Localist Turn' and 'Local Identity' in Later Imperial China," *Late Imperial China* 24, no.2 (2003): 1-50.

25 陳雯怡，〈「吾婺文獻之懿」——元代一個鄉里傳統的建構及其意義〉，《新史學》20.2 (2009.6): 43-114；李卓穎，〈地方性與跨地域性：從「子游傳統」之論述與實踐看蘇州在地文化與理學之競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82.2 (2011.6): 325-398；李宗翰、鄭莉，〈家族、婚姻與道學：《仙溪志·人物傳》中的社會關係〉，收入包偉民、劉后濱主編，《唐宋歷史評論》第3輯（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7），頁33-48。李、鄭二人既利用 CBDB 人物資料庫分析，也反省資料庫的限制。

26 Benjamin A. Elman, *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 Intellectual and Social Aspects of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Cambridge, Mass.: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84);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27 Jui-sung Yang, *Body, Ritual, and Identity: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Early Qing Confucian Yan Yuan (1635-1704)* (Leiden: Brill, 2016)；呂妙芬，《陽明學士人社群：歷史、思想與實踐》（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3）。

究地方學派或思想文化的重要時空背景與知識。

留美回臺工作的思想史家如黃進興、朱鴻林、陳弱水、王汎森、張壽安、丘為君等人，在 1990 年代之後的研究也更多元。朱鴻林研究孔廟從祀與鄉約制度、儒者出處之抉擇、經筵與政治，以及《明儒學案》；²⁸ 黃進興研究孔廟崇祀制度與思潮變化、比較儒學聖賢與天主教聖徒；²⁹ 陳弱水全方面考量中古歷史環境，從各個面向研究中唐的儒學復興，並且跨足唐代婦女研究領域；³⁰ 王汎森以貫通 15-20 世紀的長期歷史視野，結合生活史、政治史，從事學術思想史的研究；³¹ 張壽安嘗試從 18 世紀禮學考證學中讀出學者們對於經驗世界秩序的不同看法；³² 丘為君從晚清民國學者對清代考證學的反思、歐戰的刺激等角度，探討中國近代思想轉型。³³ 這些研究都體現政治、社會、制度與思想交會的複雜歷史圖景。

1990 年代以降國內博士論文也很少再以「某一位人物思想研究」為題，更多是討論時代思潮變化、學派與學術社群活動、思想與實踐、學科與學制的關係、歷史記憶的建構等問題。³⁴ 舉例而言，「王學、家族與地方

28 Hung-lam Chu, "The Debate over Recognition of Wang Yang-ming",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48 (1988): 47-70; 朱鴻林，《中國近世儒學實質的思辯與習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孔廟從祀與鄉約》（北京：三聯書店，2015）；《儒者思想與出處》（北京：三聯書店，2015）；《致君與化俗：明代經筵鄉約研究文選》（香港：三聯書店，2013）。朱鴻林，《《明儒學案》研究及論學雜著》（北京：三聯書局，2016）。

29 黃進興，《優入聖域：權力、信仰與正當性》（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4）；《聖賢與聖徒》（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1）。黃先生最新出版孔廟研究的日、英文著作為《孔子廟と儒教：學術と信仰》（東京：東方書店，2020）；*Confucianism and Sacred Space: The Confucius Temple from Imperial China to Toda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20)。

30 陳弱水，《唐代文士與中國思想的轉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此書為 2009 年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出版《唐代士人與中國思想的轉型》一書的增訂本；《唐代的婦女文化與家庭生活》（臺北：允晨文化公司，2006）。

31 王汎森，《中國近代思想與學術的系譜》（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3）、《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3）、《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7）。

32 張壽安，《十八世紀禮學考證的思想活力：禮教論爭與禮秩重省》（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1）。

33 丘為君，《戴震學的形成》（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04）；《啟蒙、理性與現代性：近代中國啟蒙運動 1895-1925》（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8）。

34 當然還是有例外，魏綵瑩的博論研究廖平、葉毅均的博論研究范文瀾，都做出很好的成

社會——以吉水、安福兩縣為例」(張藝曦 2004)、「一心運時務：正德時期(1506-21)的王陽明」(楊正顯 2007)是結合政治史、社會史與思想史的研究；「學術與制度：學科體制與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劉龍心 2000)、「當『社會』變為一門知識：近代中國社會學的形成及發展」(韓承樺 2016)、「『中國經濟』的誕生：經濟治理、知識生產與公共想像(1906-1992)」(林易澄 2017)、「現代『中國古代政治制度史』典範的起源」(施淳益 2018)，主要探討現代學術體制下新學科的誕生與發展；「清華國學研究院與近代中國學術的發展」(李顯裕 2011)則討論學術機構與學術內涵的關係。

1990年代的臺灣「新文化史」研究已經相當興盛，研究議題多元，法制、身體、醫療、藝術、感官、記憶、科技、媒體、日常生活、物質文化等面向的研究交織會聚。此時不少西方新文化史著作的中譯本出版，³⁵西方文化理論的引進速度也更快，人類學與史學的結合、歷史學的語言學轉向、後現代史學、後殖民理論批判、性別視角等，都深受學界關注。吉爾茲(Clifford Geertz, 1926-2006)的「深厚描寫」(thick description)，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 1936-2015)「想像共同體」，霍布瓦克(Maurice Halbwachs, 1877-1945)「集體記憶」，皮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 1930-2002)「文化資本」、「慣習」、「場域」，薩伊德(Edward W. Said, 1935-2003)「東方主義」等概念，經常出現在史學著作中。在豐富的文化理論與後現代解構的洗禮下，歷史學者對於文本分析更為謹慎敏銳，對於探究歷史如何被書寫建構也愈發有興趣。雖然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對於歷史方法的批判性，讓他的作品和史學存在著一定張力，但是他的書在20世紀末的臺灣非常風行，是史家「必讀」的作品。他的知識考古學、知識形構的斷層，對於身體的規訓、權力與知識的關係等，都深刻影響著史學的思考與選題。³⁶瘋狂、疾病、監視、規訓、日常政治等，成為熱門的課題；論域(discourse)分析也成為

續，兩人的博論均已出版為專書。魏綵瑩，《經典秩序的重構：廖平的世界觀與經學之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8)；葉毅均，《走向馬克思主義史學之路——范文瀾前傳》(臺北：三民書局，2020)。

35 例如，麥田出版公司出版的「歷史與文化叢書」書系在1990年代已出版不少文化史著作。

36 歷史學者對於傅柯的接受、批評與反思，可見 Jan Goldstein ed., *Foucault and the Writing of History* (Cambridge, Mass.: Blackwell, 1994).

理解一個時期思想型態與知識結構的重要研究方法。

沈松橋於 1997 年出版〈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探討在晚清國族建構過程中，「黃帝」如何被型構成中華民族的始祖，而不同的政治理念與勢力又如何參與「黃帝」與「國族」的論述。³⁷ 這篇論文對於學界有深遠的影響，類似的提問與分析在後來的著作中日益普遍。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探討「病夫」、「黃禍」、「睡獅」三個西方視野中的中國形象在近代中國思想論述中的意涵，及其反映出中國知識分子的複雜心理，書中亦分析國族符號形成的複雜歷史因素。³⁸ 潘光哲研究華盛頓形象及美國式民主被引介進入中國，被中國人所想像、論述與接受的過程，其中雖有製造神話的成分，但其作為政治動員與型塑近代中國政治文化的力量則毋庸置疑。³⁹

近 20 年的史學博論也有許多探討歷史記憶與書寫、時代與思潮興衰的研究。例如：「近代中國『民主想像』的興起（1837-1895）」（潘光哲 1999）、「學術與時代：整理國故運動的興起、發展與流行」（陳以愛 2001）、「先秦知識分子的歷史論述」（謝昆恭 2004）、「西漢前期政治思想的轉變及其發展——從黃老思想向獨尊儒術的演變」（李昱東 2005）、「唐代的歷史記憶」（廖宜方 2008）、「魏晉南朝命運觀：儒釋道三家的理論與實踐」（劉永中 2018）、「融道入儒：唐宋思想轉型期間的士人與道家傳統」（李長遠 2014）、「經典詮釋與權力競逐：北宋前期『太平』的形塑與解構（960-1063）」（張維玲 2014）、「筆記明志：明代中期的歷史書寫」（張運宗 2014）、「主義是從——國民政府的『主義化』推動（1925-1937）」（翁稷安 2014）等。

對於歷史書寫的反思一直是史學家關心的課題。彭明輝從博士論文即關注史學的書寫，著有《歷史地理與現代中國史學》、《晚清的經世史學》等書；⁴⁰ 劉龍心的博論探討現代中國史學的建立，她的近作《知識生產與傳播：

37 沈松橋，〈我以我血薦軒轅——黃帝神話與晚清的國族建構〉，《臺灣社會研究季刊》28（1997.12）：1-77。

38 楊瑞松，《病夫、黃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6）。

39 潘光哲，《「華盛頓神話」與近代中國政治文化》（臺北：國史館，2020）。

40 彭明輝，《歷史地理學與現代中國史學》（臺北：東大出版社，1995）；《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

現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討論在民族國家體制下現代史學如何形成、新的歷史知識如何建構，並以社群網絡、文字載體等角度探討歷史知識的傳播。⁴¹ 衣若蘭結合性別史與史學史，探討《明史·列女傳》的編纂過程，以及史官筆下的貞節烈女形象；⁴² 黃聖修研究清朝編纂《明史·儒林傳》的過程，以及相關的學術論辯。⁴³ 閻鴻中討論錢穆對傳統中國史學的詮釋、劉知幾（661-721）史學思想之學術淵源，以及漢唐間史學理想的轉變。⁴⁴ 至於北宋史學史研究，李卓穎〈從委諸天命到追究責任：南唐舊臣入宋之後的歷史認知與書寫〉與〈北宋前期改作五代史之研究〉等著作，仔細探討歷史書寫與作者身分認同間的關係；宋家復則從《冊府元龜》的編纂與內容，討論北宋初期類書式的歷史書寫。⁴⁵

另外，近年由於許多古籍重刊、資料庫建置、圖書館使用方便，史料文獻取得更容易，研究一本書或同一文類文本在不同時期的刊本與註解，以分析思潮變化及歷史意涵，或從出版史、閱讀史角度去觀察書籍的流通及其與人的互動，也是許多人採取的研究視角。舉例而言，《大學》作為明代理學最重要的文本，關係著學聖的工夫進程，不僅王陽明以詮釋《大學》文本的方式挑戰朱熹的思想，晚明許多思想家都緊扣《大學》詮釋來定學問之宗旨，故研究《大學》不同版本與詮釋的著作相當多。李紀祥早在 1980 年代便研究兩宋以來《大學》的改本；⁴⁶ 鍋島亞朱華研究李材（1529-1607）和許孚遠

41 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現代中國史學的轉型》（臺北：三民書局，2019）。

42 衣若蘭，《史學與性別：《明史·列女傳》與明代女性史之建構》（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11）。

43 黃聖修，《一切總歸儒林：《明史·儒林傳》與清初學術研究》（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2016）。

44 閻鴻中，〈錢賓四先生對中國傳統史學的詮釋〉，《錢穆先生紀念館館刊》8（2000.12）：148-167；〈義例、名教與實錄——劉知幾史學思想溯義〉，《臺大歷史學報》31（2003.6）：77-122。

45 李卓穎，〈從委諸天命到追究責任：南唐舊臣入宋之後的歷史認知與書寫〉，《漢學研究》38.2（2020.6）：133-170；〈北宋前期改作五代史之研究〉，《中國史學》（日本中國史學會）26（2016）：37-74；宋家復，〈從《策府元龜》論北宋初期類書式歷史書寫操作的典範意義〉，《新史學》25.4（2014.12）：43-104。

46 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

(1535-1604) 的《大學》詮釋，以及《大學》在日本的流傳；⁴⁷ 中國大陸學者劉勇近期也出版了一本專研明末《大學》改本的專書。⁴⁸《四書》學的詮釋亦很受學界關注，日本學者佐野公治《四書學史的研究》討論從宋元到明清的《四書》學術史，中譯本 2014 年在臺出版；⁴⁹ 鄧克銘《晚明四書說解研究》討論晚明李贄（1527-1602）、袁宗道（1560-1600）、高攀龍（1562-1626）等不同思想家的《四書》詮釋。⁵⁰ 筆者《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則是以中國近世的大量《孝經》刊本與註釋為研究對象，一方面藉由分析不同時期《孝經》的詮釋以突顯時代思潮的變化，另一方面也從《孝經》與人互動的角度，說明《孝經》作為經典、蒙書、女教典籍、善書、宗教實踐文本等的多元性質，即試圖兼顧書籍文本內涵與書籍社會文化史兩種研究取徑。⁵¹ 事實上，這類以某一文本和文類為主的研究相當普遍，例如：酒井忠夫（1912-2010）研究中國善書，伊沛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研究《家禮》系列文本，包筠雅（Cynthia Brokaw）針對功過格類文本的研究，三浦秀一研究科舉與性理類書籍，沙培德研究教科書等都運用了類似的方法。⁵² 在史料重刊、圖書館與資料庫使用方便的條件下，預期類似的研究取徑未來會更為普遍。

閱讀史是近年文化史研究的熱門課題。⁵³ 閱讀史研究與書籍印刷、出版

47 鍋島亞朱華對於中、日學者的《大學》與《四書》詮釋有許多著作，參見 <http://www.cl.nthu.edu.tw/p/406-1401-39913.r2884.php?Lang=zh-tw>，檢索日期：2021/1/21。

48 劉勇，《變動不居的經典：明代《大學》改本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16）。

49 佐野公治著，張文朝、莊兵譯，《四書學史的研究》（臺北：萬卷樓圖書公司，2014）。

50 鄧克銘，《晚明四書說解研究》（臺北：里仁書局，2013）。

51 呂妙芬，《孝治天下：〈孝經〉與近世中國的政治與文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1）。

52 酒井忠夫，《中國善書の研究》（東京：光洋社，1972）；Patricia Buckley Ebrey, *Confucianism and Family Rituals in Imperial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Writing about Rit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Cynthia Brokaw, *The Ledgers of Merit and Demerit: Social Change and Moral Order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1); 三浦秀一，《科舉と性理学：明代思想史新探》（東京：研文出版社，2016）；沙培德，〈敘事與教誨：教科書中的知識傳遞（1902-1937）〉，收入沙培德、張哲嘉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3），頁 231-270。

53 關於西方閱讀史研究，見李仁淵，〈閱讀史的課題與觀點：實踐、過程、效應〉，收入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19），頁 71-114。

業、文本流通等密切相關，其中特別需要記錄人們閱讀經驗的史料，然而後者並不易得，因此討論書籍史的作品雖多，但能深論閱讀實踐的著作相對少。⁵⁴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利用大量報刊書籍，追索晚清士人的西學知識來源；⁵⁵ 李仁淵從碩論以來即研究媒體與知識的關係，其《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討論晚清新式出版業與士人的轉型，博士論文則討論明清福建基層社會中文字媒介的作用。⁵⁶

新史料對於史學研究一直是重要的條件，中國近現代檔案史料不斷整理開放、明清文集大量重刊，都深切影響研究的發展。上古史研究更是因考古發現而大大改觀。從 1970 年代馬王堆帛書出土，1990 年代郭店楚墓竹簡出土，直到今日仍不斷有新的文獻出土，對於先秦思想研究意義深遠，大幅改變了上古思想史的研究風貌。以郭店楚簡為例，出土的儒家文本被認為具有填補孔、孟之間（戰國中期）儒學思想史的意義，部分篇章也被認為與《子思子》有關，引起學界高度重視。⁵⁷ 近年來海內外學者不斷推出新的研究成果，關於出土文獻的研究，本書另有專章討論，此處僅強調今日上古思想史研究已大不同於以往，研究者需要兼顧考古、出土文獻和傳統文獻，雖然學者對於抄本與傳統文獻孰輕孰重或如何兼採的看法未必一致，但承認三方面不可偏廢已成共識。⁵⁸

54 研究明清商業出版和書籍史的著作不少，參見涂豐恩，〈明清書籍史研究回顧〉，《新史學》20.1 (2009.3): 181-225。

55 潘光哲，《晚清士人的西學閱讀史（1833-1898）》（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4）。

56 李仁淵，《晚清的新式傳播媒體與知識份子：以報刊出版為中心的討論》（臺北：稻鄉出版社，2005）；“Making Texts in Villages: Textual Production in Rural China during Ming-Qing Period” (PhD dissertation, Harvard University, 2014).

57 龐樸，〈孔孟之間——郭店楚簡中的儒家心性說〉、李學勤，〈荊門郭店楚簡中的《子思子》〉，收入姜廣輝主編，《中國哲學》第 20 輯（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9），頁 22-35、75-80。顧史考（Scott Cook）也認為郭店楚簡代表戰國中期思想，對於理解先秦思想史的形成有重要意義。顧史考，《郭店楚簡先秦儒書宏微觀》（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6）。

58 鄭吉雄，〈海外漢學發展論衡——以歐美為範疇〉，《依大中文與教育學刊》2 (2020.12): 1-59。

（三）概念史、詞彙史、翻譯研究

概念史研究近年相當熱門。以柯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 1923-2006）為首的德國概念史學派，強調歷史上一些重要的概念既是歷史進程的指標，也是影響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因此藉由分析「重要關鍵概念」（key concepts）的發展歷程，有助於我們捕捉歷史的轉折與變化。這類的研究取徑既是研究語言與概念變化的歷史，同時也是研究政治與社會的歷史。⁵⁹ 由於中國從晚清到民國經歷巨大的歷史轉型，研究者運用概念史的方法，針對一些「重要關鍵概念」進行研究，闡析中國近現代歷史的進程。⁶⁰ 不過，中國走向現代的過程受到西方制度、知識與價值觀的影響極深，因此研究這段時間的概念史，不僅要顧及從傳統到現代的變化，更要考察語彙與概念的全球性流通。例如，從歐洲到日本再轉譯進入中國的傳播路徑，發揮了重要的歷史作用，因而也要求研究者更關注中國與日本的交流。⁶¹ 概念史的研究取徑也因此常與詞彙史、翻譯研究連結，且強調語彙與概念在跨文化間轉譯的歷程與內涵變化。

金觀濤、劉青峰很早就投入觀念史研究，他們的方法論並非承襲德國概念史學派或英國觀念史學派。據其自述，他們之所以將研究焦點轉向文句語

59 關於柯塞雷克概念史的研究，參見方維規，〈概念史研究方法要旨——兼談中國相關研究中存在的問題〉，收入《新史學》第3卷（北京：中華書局，2009），頁3-20；陳建守，〈語言轉向與社會史：科塞雷克及其概念史研究〉，《東亞觀念史集刊》4（2013.6）：171-221；〈作為方法的概念：英語世界概念史的研究回顧與展望〉，收入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頁175-205。關於德國概念史及其面對的批評與修正，見湯志傑，〈重新認識現代性的必要：來自概念史與知識社會學的初步反省〉，《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64（2018.3）：49-112。對於如何研究中國概念史的思考，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9），頁299-308；孫江，〈序〉，收入氏編，《亞洲概念史研究》，第1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頁1-10，以及該冊中「概念史與東亞研究」圓桌會議紀要，頁234-259。

60 雖然概念史的方法未必只適用於轉型時期研究，但中國史的學者們目前確實以研究晚清民國時期為多。

61 舉例而言，沈國威、陳力衛的研究都以近代中日之間語詞和概念的交涉為主。沈國威，《新語往還：中日近代語言交涉史》（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20）；陳力衛，《東往東來：近代中日之間的語詞概念》。沈國威書中第三章針對中、日近代新詞的研究進行回顧介紹。

彙，乃因認為語彙是比意識形態更穩定的單位。他們認為意識形態可以轉化為改造社會的行動，而意識形態由觀念組成，故要理解意識形態的形成與變化，就必須要研究觀念的歷史，特別是探討表達觀念的關鍵語詞。⁶² 他們考察科學、民主、權利、革命、個人等現代重要語彙與觀念的歷史，也建置「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並利用資料庫作語詞的量化分析，其成果可見於《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⁶³ 他們又與政治大學合作，與中、臺、日、韓等地學者共同提倡研究東亞觀念史，並於 2011 年創辦《東亞觀念史集刊》，⁶⁴「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專業數據庫」也由政大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繼續建置與維護，並更名為「中國近現代思想史及文學史專業數據庫（1830-1930）」，鄭文惠擔任計畫主持人。鄭文惠近年也以資料庫結合數位人文語詞探勘技術，研究中國近代的概念和語詞。⁶⁵ 另外，陳瑋芬專研日本漢學，近年更多處理中、日與東、西跨文化概念史的研究，她針對倫理、道德、自然、文明、文化、自由等語彙觀念進行研究，著作非常豐富，代表作之一為《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2005）。⁶⁶ 陳建守是國內年輕一代史家中少數專注於概念史與詞彙史的研究者，他的博論研究西方的「Enlightenment」如何在中國被譯作「啟蒙運動」的過程，除了考察翻譯語意的變化過程，也探討「啟蒙運動」作為概念工具，如何引導人們認知過去、想像未來。⁶⁷

中研院近史所於 2011-2013 年間由張壽安研究員主持「近代中國知識轉

62 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香港：香港中文大學，2008），頁 4-6。

63 此書出版後，學者就方法論有一些討論，參見韓承樺，〈評金觀濤、劉青峰，《觀念史研究——中國現代重要政治術語的形成》〉，《新史學》24.4 (2013.12): 201-212。

64 鄭文惠撰寫的發刊詞，見 <http://asiademo.com/jhiea/%e7%99%bc%e5%88%8a%e8%a9%9e/>，檢索日期：2021/2/2。

65 例如，鄭文惠、邱偉雲，〈數位人文視野下近代「新／舊」話語的交鋒與激辯〉，《清華中文學報》22 (2019.12): 173-246。

66 陳瑋芬，《近代日本漢學的「關鍵詞」研究——儒學及相關概念的嬗變》（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其他著作見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people/researchers/Chen,%20Wei-fen>，檢索日期：2021/2/2。

67 陳建守，「啟蒙如何運動：近代中國『啟蒙運動』的概念史」，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

型與知識傳播，1600-1950」主題研究計畫，此計畫雖然不特別標榜以概念史研究為主，但包含翻譯和概念史的課題，參與子計畫的孫江則是學界中提倡概念史研究的健將，目前擔任《亞洲概念史研究》主編。此主題計畫舉辦多場學術研討會，擅於概念史研究的陳力衛、方維規等學者均有參與。⁶⁸ 與此同時，中研院近史所成立「知識史研究群」，籌組 2012 年第四屆國際漢學會議的部分內容，會後出版《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沙培德、張哲嘉在書的導言中說道：「如果思想史家慣於關注的是個人和小團體的觀念、由這些人所引起的論爭、以及他們的觀念在宏觀社會發展裡所扮演的角色，那麼知識史家更有興趣的是眾人存有共識之處、此一共識的發展過程和制度性基礎、以及某種知識如何適應於社會中掌握支配性的知識體系，甚或為如何與社會中掌握支配性的知識體系相互適應。」⁶⁹ 這種知識史的研究，勢必與觀念的變化、翻譯，以及知識傳播的基礎建設，包括教育體制、出版印刷、媒體、政治社會條件等有關；而中國近代新知識體系的建構，又與中國從傳統到現代的巨烈轉型密切相關。另外，要理解近代知識體系的內涵、詞彙的運用與變化等，百科全書、字典、詞典是重要的工具，學界對於百科全書與各種字典、辭典的研究也相當熱絡。⁷⁰ 中研院近史所也建置「英華字典資料庫」，並於 2015 年舉辦「英華字典與近代中國學術研討會」。⁷¹

另外，林毓生於 1999 年曾帶領「公民社會基本政治社會觀念研究」計畫，擬針對自由、民主、平等、法治、人權、憲政、理性、公民等觀念進行研究梳理，說明每個觀念的歷史、內容與意涵，同時「追溯與釐清這些觀念

68 關於此主題計畫的簡介，參見 mingching.sinica.edu.tw/mingchingadminweb/SysModule/mvc/friendly_print.aspx?id=296，檢索日期：2021/1/16。大約同時，中國復旦大學、中山大學、澳洲國立大學、德國等地也有類似的大型研究計畫。見劉龍心，《知識生產與傳播》，頁 9-13。

69 沙培德、張哲嘉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頁 2。

70 舉例而言，晚清的百科全書與知識建構，參見 Milena Doleželová-Velingerová and Rudolf G. Wagner eds., *Chinese Encyclopaedias of New Global Knowledge (1870–1930): Changing Ways of Thought* (Heidelberg: Springer, 2014)。又如，高哲一（Robert J. Culp），〈定義現代性：《辭源》與現代中國語彙的創制〉，收入沙培德、張哲嘉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頁 295-323。

71 會議議程見：http://www.mh.sinica.edu.tw/MHDocument/Event00/Event_742_File1.pdf，檢索日期：2021/1/16。

在近現代中國歷史脈絡中，如何在論述中出現，以及它們與西方憲政民主下同樣詞彙所代表的觀念之間的相容性、差異、或誤解的基本理由。」⁷² 研究成果於 2014 年出版《公民社會基本觀念》2 冊。雖然此書並未標榜採取概念史研究取徑，書中各章的內容和寫法也不盡相同，不過書中收錄的論文仍有概念史研究的傾向。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近代中國的「國民」概念，1895-1911〉二文，探討現代中國「民族」與「國民」概念的形成與意涵。這些概念雖亦取資傳統文化資源，但更多是在世界潮流衝擊下被建構、想像出來的文化產物，既深受現實政治需要與意識形態的影響，也被用以凝聚中國人之認同，成為各類政治動員的工具，同時也是推進中國近現代歷史發展的重要因素。⁷³

至於翻譯的研究，主要屬於文學或比較文學的領域，史學家涉獵較少。⁷⁴ 不過，近代西學東傳對於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衝擊與影響極大，翻譯所涉及的不僅是文字，更是知識、價值觀、文化，甚至權力。明末清初耶穌會士帶入的西學是中西交流史輝煌的一頁，耶穌會士翻譯的西學內容，包括神學、數學、天文學、醫學、文學各類文本，他們同時翻譯、介紹中國經典與文化進入西方，成為西方啓蒙思想的參考，也是西方漢學的源頭。這部分的研究近年十分熱門，可參見鐘鳴旦（Nicolas Standaert）等人建置的 The Chinese Christian Texts Database (CCT-Database)，以及本書中潘鳳娟所撰寫的專章。國內研究中西交流史者，可以黃一農、祝平一、李爽學、潘鳳娟等為代表。黃一農提倡 e- 考據的研究方法，近年雖集中研究《紅樓夢》，但早期研究古代天文學，以及天主教入華後引發的曆改與政爭、武器與軍事、信仰與文化衝突等，其《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是一部備受肯定的著作。⁷⁵ 祝平一主要研究中西交流史中的曆算學與醫學，近年也從書籍史的角

72 林毓生，〈主編序〉，收入氏編，《公民社會基本觀念》（臺北：中央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心，2014），頁 v-vi。

73 沈松橋，〈近代中國民族主義的發展：兼論民族主義的兩個問題〉、〈近代中國的「國民」概念，1895-1911〉，收入林毓生主編，《公民社會基本觀念》，頁 547-607、727-783。

74 臺灣從 1950 年代到 1990 年代從事翻譯的情形，見鄒振環，《20 世紀中國翻譯史學史》（上海：中西書局，2017），頁 92-136。

75 黃一農，《兩頭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新竹：清華大學出版社，2005）。

度研究知識被改造、挪用與創新。⁷⁶ 李爽學 2005 年出版《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一書，探討歐洲證道文學如何被轉譯進入晚明中國，他對於艾儒略《聖夢歌》、高一志《聖母行實》、陽瑪諾《輕世金書》、賀清泰《古新聖經》等翻譯作品，都有精闢的研究。⁷⁷ 潘鳳娟早期研究艾儒略，近年專研《孝經》與《道德經》的不同西文翻譯，以此探討西方漢學的流變。⁷⁸

晚清民國時期西學譯著進入中國數量更多，影響也更大。劉禾（Lydia Liu）*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跨語際實踐：文學、民族文化與被譯介的現代性》）一書雖屬文學研究，但作者自述本書主要欲探討的並不是技術意義上的翻譯，而是考察新詞語、意義、話語的興起，及其如何在本國語言中獲得合法性的過程，藉此說明翻譯與現代性的關係。這部書在學界深具影響力，1990 年代以來「翻譯與現代性」是熱門的議題，「跨語際實踐」已成為眾人熟知的學術術語，也出現在大量的著作中。⁷⁹

上文提及史華茲研究嚴復的名著《追求富強》，書中論及嚴復多部譯著，比較譯文與原著的差異，並討論嚴復的思想與選擇。黃克武也研究嚴復的翻譯，撰有兩部專書，並嘗試提出己見與史華茲對話。⁸⁰ 黃克武透過詳細比對彌爾（John S. Mill, 1806-1873）*On Liberty* 與嚴復《群己權界論》的文字，指出嚴復對於「個人」的看法與彌爾不同。他認為嚴復受儒家「樂觀主義認識論」的影響，其思想不契於彌爾之「悲觀主義認識論」，故不能深刻理解彌

76 祝平一著作見：<https://www2.ihp.sinica.edu.tw/staffProfile.php?TM=3&M=1&D=1&uid=27>，檢索日期：2021/2/2。

77 李爽學，《中國晚明與歐洲文學》（臺北：中央研究院、聯經出版公司，2005）。其他著作見 <http://www.litphil.sinica.edu.tw/people/researchers/Li,%20Sher-shiueh>，檢索日期：2021/2/2。

78 潘鳳娟有關西方翻譯《孝經》的專書即將出版，學術期刊論文及《道德經》翻譯研究成果，參見 <http://www.deas.ntnu.edu.tw/front/Faculty/Fulltime/member.php?ID=bnRudV9kZWZzJkZ1bGx0aW1l&PID=12>，檢索日期：2021/2/2。

79 Lydia H. Liu, *Translingual Practice: Literature, National Culture, and Translated Modernity China, 1900-1937*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80 黃克武，《自由的所以然：嚴復對約翰彌爾自由思想的認識與批判》（臺北：允晨文化公司，1998）；*The Meaning of Freedom: Yan Fu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Liberalism* (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8)。

爾思想中自由之所以然（己重群輕式的個人主義）。嚴復調適的思想傾向終未能在近代中國發揮大的影響；相對地，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 1712-1778）式的民主觀與傳統儒家的政治理念與道德語言較容易結合，故能在近代中國蔚為風潮。⁸¹ 至於盧梭《民約論》進入東亞知識人的視野，「東洋盧梭」中江兆民（1847-1901）是重要的中介者，中江兆民透過翻譯與註解不僅引介盧梭的思想，也以其創造性的解讀盧梭來倡導民主革命，他的譯本在中國多次被重刊，發揮重要的影響。⁸² 蕭高彥檢視中江兆民、楊廷棟（1879-1950）劉師培（1884-1919）和馬君武（1881-1940）對盧梭《民約論》的譯文與詮釋，認為中江兆民將「主權者」譯為「君」，產生了與盧梭思想不同的政治想像，拉近了與儒家政治思想的關係，也深刻影響中國知識分子。而楊廷棟的詮釋接近立憲主義，劉師培則能讀出某種革命主張，要到馬君武的譯本出現之後，中文世界才能精確地理解盧梭。⁸³

國內關於觀念史、概念史的未來走向如何？是否會朝著更全球化的範圍去追索概念的流布與變化？還是挑戰不同的歷史時段研究？會更強調與數位人文技術結合？抑或將考察的焦點從關鍵概念擴展到不太重要的概念考察？未來國內史家中有多少人會專致於概念史研究，並對概念史的方法提出反思與改進？這些目前都還言之過早，但無疑地，這個研究取徑對於晚近中國近現代思想史研究是重要的，未來的走向值得關注。

（四）全球思想史、東亞儒學與文明

近年史學最熱門的風潮是全球史，思想史亦不例外。全球思想史主要欲打破國別史、國族中心主義、中心與邊陲的視野與框架——既打破空間上疆域的限制，也破除國族意識型態的限制——更重視思想觀念在全球間流傳、碰撞、混雜、變異的多元樣貌。民族國家的興起與普及畢竟只占人類歷史中

81 此處樂觀和悲觀主義認識論採用墨子刻的分法，前者對於人能理解把握真理較為樂觀，後者傾向懷疑主義或相對主義，見墨子刻，〈中國近代思想史研究方法上的一些問題——一個休謨後的看法〉，《近代中國史研究通訊》2（1986.9）：46。

82 狹間直樹著，袁廣泉譯，〈「東洋盧梭」中江兆民在近代東亞文明史上的地位〉，收入沙培德、張哲嘉主編，《近代中國新知識的建構》，頁53-68；范廣欣，〈盧梭「革命觀」之東傳：中江兆民漢譯《民約論》及其上海重印本的解讀〉，《思想史》3（2014.9）：67-102。

83 蕭高彥，〈《民約論》在中國：一個比較思想史的考察〉，《思想史》3（2014.9）：106-158。

很短的時期，歷史中大部分人們都生活在其他政治體制中，特別是帝國。⁸⁴自古帝國之間即透過貿易、戰爭而交流，當近代蒸氣船、鐵路、電報發明之後，全球的距離更因科技而縮短，交流更密切，思想史家也必須在更大空間範圍內追溯思想觀念的傳布與脈絡，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因此提倡「思想史的國際轉向」。⁸⁵目前許多研究都關注思想觀念在不同區域間的旅行與交流；思想傳播的中介者、翻譯活動與文本、不同思想碰撞後的相互影響、思想交流所形成的網絡等，都是研究的重點。⁸⁶雖有人認為這類跨國的交流史研究並不新穎，佛教東傳、中西交流史、東亞交流史、翻譯史等都是行之有年的研究領域，早存於近年全球史風潮之前；然而以國內史學研究風潮而言，近年間確實是有明顯的變化。1990年代臺灣史學界非常熟悉「辨析差異」的研究視角，這種透過微觀辨異挖掘「同質表象」底層的差異性和複雜脈絡，以及對文本的詮釋與解構，帶領學者們不斷挑戰宏觀的論述，甚至有歷史學碎片化的現象。此與近年來學界不斷舉辦各類「全球視野下的○○學術研討會」，藉由人、事、物跨越的流動來串聯全球網絡的視野，確實大不相同。不過，今天雖然大家都同意研究思想史要注意全球的脈絡，然應如何進行研究和書寫仍是困難的挑戰。⁸⁷葛兆光則認為在傳統東亞和中國，國家（王朝、皇權）強烈影響著思想內涵，因此國別史仍有重要的意義，他主張在強調思想史國際轉向時，亦不能忽略「國家」的因素。⁸⁸

以跨國大區域的思想史研究而言，臺灣近20年來最突出的是對於「東亞」儒學與文明的研究，其他許多會議雖也強調具有「全球史」的視野，但多半是不同區域與文化「接遇的歷史」或「比較的歷史」，整體的成果仍較

84 關於晚近歐美史學中的全球史轉向，參見蔣竹山，〈超越民族國家的歷史書寫：晚近歐美史學研究中的「全球轉向」〉，收入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頁287-314。

85 大衛·阿米蒂奇，〈思想史的國際轉向〉，《思想史》1（2013.9）：213-241。

86 傅揚，〈思想史與歷史研究：英語世界的若干新趨勢〉，收入蔣竹山主編，《當代歷史學新趨勢》，頁141-173。

87 對全球史研究之研究視角、方法與書寫等的反思，見 Maxine Berg ed.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Global: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88 葛兆光，〈「思想史國際轉向」與東亞或中國思想史研究——對 David Armitage 教授〈思想史的國際轉向〉一文〉，《思想史》1（2013.9）：257-265。

不顯著，故以下主要說明東亞思想史的研究成果。⁸⁹ 東亞研究在 21 世紀初的臺灣逐漸成為顯學，2003 年臺灣大學成立「東亞文明研究中心」是重要的指標。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設置初期，以「儒學與東亞文明」和「東亞教育與考試制度」兩大主題為主，整合校內外研究人力，全力推展東亞研究並培育人才。⁹⁰ 黃俊傑、高明士等人是重要推手。高明士早在 1984 年即出版《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東亞世界形成史的一個側面》一書，從漢字、儒教、法令、科技、宗教等側面說明東亞文化圈的形成，比較東亞各國教育體制之異同，並討論東亞世界的政治秩序。⁹¹ 他帶領的東亞研究團隊也持續研究東亞傳統教育、禮儀、法制，並出版多種論文專書。⁹² 黃俊傑更是全力帶領臺大東亞研究計畫，從東亞儒學的經典詮釋到文化研究，從「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轉型為「臺灣大學人文社會高等研究院」，20 年來成果斐然。他呼籲更全面而深刻地研究東亞各國的交流，並要能深刻瞭解東亞各國的文化差異，反思東亞文化的特質及其對全體人類文明的意義。⁹³ 黃俊傑先生著作等身，除了有關孟學、仁學、東亞文明精神的研究外，《東亞儒學：經典與詮釋的辨證》（2007）、《東亞文化交流中的儒家經典與理念：互動、轉化與融合》（2010）等書主要探討「東亞儒學」研究的意義，及東亞儒者對儒學經典的詮釋。⁹⁴

在教育部 5 年 500 億「邁向頂尖大學計畫」的經費助益下，臺大東亞研究團隊召開了許多國際學術研討會，出版一系列東亞研究叢書，這一波東亞思想史研究的成果可以臺大出版中心「東亞文明研究叢書」、「東亞儒學研究

89 目前國內許多大學都設有東亞研究、東南亞研究的中心，雖多數為當代國際關係與區域研究，但也包括歷史研究。各中心網頁，見臺灣東亞與東南亞研究相關網站，https://www.rchss.sinica.edu.tw/capas/other_webs/taiwan-asia.htm，檢索日期：2021/1/24。

90 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設置辦法，參見國立臺灣大學東亞文明研究中心設置辦法，http://host.cc.ntu.edu.tw/sec/All_Law/D/D-13.html，檢索日期：2021/1/24。

91 高明士，《唐代東亞教育圈的形成：東亞世界形成史的一個側面》（臺北：國立編譯館，1984）。

92 高明士主編，《東亞傳統教育與學禮、學規》（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東亞傳統家禮、教育與國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5）。

93 江俊億專訪黃俊傑教授 http://mingching.sinica.edu.tw/Academic_Detail/144，檢索日期：2021/1/28。

94 黃俊傑的著作，見 <http://huang.cc.ntu.edu.tw/annal-books.html>，檢索日期：2021/1/28。

叢書」等系列為代表，該叢書目前已出版近 200 冊。⁹⁵ 張崑將〈近二十年來台灣的「東亞儒學」研究取向與發展特色〉一文，分析「東亞文明研究叢書」與「東亞儒學研究叢書」中有關東亞儒學共 54 本著作，歸納出 7 項研究趨勢如下：東亞四書學與經典詮釋、朝鮮朱子學、東亞陽明學、東亞教育史、東亞儒學人物思想與形象交流、東亞宗教對話、東亞儒學中的關鍵概念史研究。⁹⁶

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也曾執行「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與終極真理」（2013-2014）、「近代東亞與西方交流中的跨文化現象」（2012-2015）、「東亞思想中的語言、概念與實踐」（2021-2023）等研究計畫，並與臺大東亞文明研究中心密切合作。文哲所也出版了《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東亞視域中的儒學》、《東亞哲學的生死觀》等論文專書。⁹⁷ 另外，李明輝、林月惠等研究員均投入朝鮮儒學的研究。⁹⁸ 鍾彩鈞則帶領團隊研究越南儒學，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越南》與《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後者從經學、史學、文學、哲學等角度研究越南著名政治家黎貴惇（1726-1784）。⁹⁹

童長義「伊藤仁齋研究：以『實』概念為中心」（1998）、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純忠與至孝思維的典型：以陽明學與兵學為中心」（2001）是國內較早以日本儒學思想為題的兩本博士論文。兩人畢業後分別任教臺大、臺師

95 書目參見 <http://www.press.ntu.edu.tw/?act=browse&field=bser&refer=> 東亞文明研究——東亞儒學研究叢書，檢索日期：2021/1/24。

96 張崑將，〈近二十年來台灣的「東亞儒學」研究取向與發展特色〉，收入北京師範大學人文宗教高等研究院編，《東亞文明的歷史與展望：東亞文明交流國際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9），頁 306-332。

97 鍾振宇、廖欽彬主編，《跨文化視野下的東亞宗教傳統》（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儒學》（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3）；周大興主編，《東亞哲學的生死觀》（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6）。

98 李明輝，《四端與七情：關於道德情感的比較哲學探討》（2005）從比較哲學的角度討論李滉（1501-1570）、李珥（1536-1584）等朝鮮儒者的思想與朱子學的異同。林月惠，《異曲與同調：朱子學與朝鮮性理學》（2010）討論朝鮮性理學的發展和思想爭議，特別對於羅欽順（1465-1547）的著作引發朝鮮儒者關於「人心道心」的論爭有詳細論述。兩書均由臺大出版中心出版。

99 鍾彩鈞主編，《東亞視域中的越南》（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5）；鍾彩鈞主編，《黎貴惇的學術與思想》（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2012）。

大，開設日本儒學史相關課程。張崑將更是全力投入東亞儒學研究，20年來耕耘不輟，著有《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德川日本儒學思想的特質：神道、徂徠學與陽明學》、《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等書。¹⁰⁰

藍弘岳主要研究 17-18 世紀日本江戶儒學史、19 世紀後期水戶學，以及中日思想比較，代表作《漢文圈における荻生徂徠：医学・兵学・儒学》（《漢文圈中的荻生徂徠：醫學・兵學・儒學》，2017）。本書的主角雖是狄生徂徠（1666-1728），但同時也透過比較中國晚明與江戶日本的詩文觀、評點學的角度，說明狄生徂徠學的方法特色及其淵源，書的第三部「漢字圈中的徂徠學派」更擴大討論徂徠學與朝鮮、明清中國的關係。¹⁰¹

國內目前從事東亞思想史研究的學者除了歷史學者外，也有任職於中文系、日文系、國家發展研究所等機構者。例如，徐興慶研究日本江戶儒學、水戶學、朱舜水思想；¹⁰² 田世民研究日本近世儒禮實踐及懷德堂儒學；¹⁰³ 金培懿研究近世日本漢學與儒學；¹⁰⁴ 金原泰介研究清代學術思想史；姜智恩研究朝鮮儒學史，她在近作《被誤讀的儒學史》中指出：20 世紀初韓國學者因受近代東亞政治情勢的影響，刻意在歷史中尋找挑戰權威的聲音，造成對 17 世紀朝鮮儒學的誤讀，忽略了當時朝鮮儒者的朱子學關懷。¹⁰⁵

臺灣研究東亞儒學的成果在國際上相當突出。據張崑將的觀察，臺灣學

100 張崑將，《日本德川時代古學派之王道政治論：以伊藤仁齋、荻生徂徠為中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4）；《德川日本儒學思想的特質：神道、徂徠學與陽明學》（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07）；《陽明學在東亞：詮釋、交流與行動》（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1）；《電光影裏斬春風：武士道分流與滲透的新詮釋》（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6）。

101 藍弘岳，《漢文圈における荻生徂徠：医学・兵学・儒学》（東京：東京大學出版中心，2017）。

102 徐興慶的著作目錄，見 <https://japan.ntu.edu.tw/ch/detail?page=2>，檢索日期：2021/2/8。

103 田世民，《近世日本儒禮實踐的研究：以儒家知識人對《朱子家禮》的思想實踐為中心》（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2）。

104 金培懿的著作目錄，見 <http://homepage.ntu.edu.tw/~ntuihs/japan/04scholar-10.htm>，檢索日期：2021/2/8。

105 姜智恩著，蔣薰誼譯，《被誤讀的儒學史：國家存亡關頭的思想，十七世紀朝鮮儒學新論》（臺北：聯經出版公司，2020）。

者既強調東亞的共通性，也尊重文化的多元性，且比韓、日、中學者都更熱衷於「東亞儒學」研究。韓國學者傾向強調韓國儒學的特色，不太談東亞儒學；日本學者則鑑於大東亞共榮圈及殖民歷史的傷害，至今仍對「東亞」議題有忌諱；中國學者尚處於極力欲恢復傳統文化、強調國學的風潮中，對於東亞研究較不熱衷。雖然以「東亞儒學」來涵蓋東亞各國的儒學傳統是否恰適仍可討論，但國內近年對於中、日、韓儒學斐然的研究成績則不容漠視。張崑將認為儒學普世性的核心價值超越國界，東亞各國間思想與文化的交流也有長期的歷史，他相信「東亞儒學」所突顯的多元共存共享的精神未來應該會有更好的發展。¹⁰⁶

四、結語：榮景中的危機

本文簡要分析了臺灣過去 40 年間歷史學高等教育與人才培育的變革，以及中國思想史研究趨勢的變化。中國思想史研究在 1980 年代達到高峰，之後逐漸走下坡；研究成果則是不斷開展新局，無論方法、議題、研究範圍都日益寬廣而豐富，有許多優良的著作與重要的突破。在一波波史學風潮的衝擊下，思想史研究可謂歷經裂變而創新。今天我們站在前輩學者們長期努力積累的學術資源之上，擁有比過去更豐富的史料、更充裕的研究經費、多元開放的研究視角、精良的研究社群，我們可以嘗試各種「跨界」的合作與實驗，利用大數據和資料探勘作研究，而且整體學術環境（包括資訊開放與流通、審查與出版的環境等）都有長足的進步，前景理應是樂觀的。

然而，這樣前瞻性的榮景是帶有陰霾的，主要因為當前人文學處於普遍低靡衰微之勢，有志於學術研究的年輕學子愈來愈少，社會可以提供專業史學人才的工作機會也很有限。加上思想史人才養成所需時間較長，學生需要從重要文本和思想家入手打好基礎，並熟悉前輩學者的研究成果，又需要在研究議題和方法上講究創新，使得研究生在選題時備感困難。平心而論，今天從事思想史研究的研究生要比 20-30 年前的研究生更辛苦，他們需要有研究個別思想家和文本分析的能力，又要熟悉各種研究方法，甚至是跨領域、

106 張崑將，〈近二十年來台灣的「東亞儒學」研究取向與發展特色〉，頁 330-332。

多面向地進行探究，並對自己選擇的研究取徑有高度的自覺，最終還要能找到具有原創性的問題意識，以及足以論證回答此問題意識的史料。面對如此困難的挑戰，除了個人的努力外，也需要優良而穩定的學術環境支撐。然而臺灣在教育改革多年後，高等教育的品質並未能整體提升，可改善的空間仍然很大，例如生師比居高不下、研究生獎學金普遍不足、各校歷史系所開設的專業課程偏少、學生的古文能力普遍下滑等。這些現象加上有志於此的學生不多，是當前思想史研究與傳承的一大隱憂。

樂觀一點想，危機意識可能帶來翻轉的契機。過去我們比較願意投資硬體設備，不太願意投資人，因為投資設備較容易看見成效，撰寫報告或被考評時容易交代；人才培育不僅需要更長的時間等待，且經常會「不如預期」。過去 20 年來我們竭力追求研究卓越，投資於老師們的研究也遠多於投資學生。對人文學的研究生而言，協助老師研究的助理工作機會確實增加不少，但獲得足夠獎學金得以專心讀書的機會仍然缺乏。近年來我們已經聽到不少人呼籲要重視這些現象，我相信當我們把眼目和資源更多放在年輕學子身上，臺灣的學術才有機會真的改變。至於國內中國思想史研究未來是否有可能翻轉逆勢？我個人不是很樂觀，尤其當我的眼界只限縮在歷史學門時，更覺得困難重重，但也仍覺得尚有可為。若我們能將研究時講求的跨界能動性與創新力，運用於教育機制與學習環境的改善，更有效地整合教育資源，做到文史哲不分家，或許在人才培育上也可以開創新局。學術的前景畢竟要靠人才來開創與維繫，行文至此，從回顧到前瞻，我相信中國思想史研究未來最重要的關鍵在於能否持續培養優秀的年輕人才。

Transformations in Research o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and Its Position in Education in Taiwan, 1980-2020

Miaw-fen Lu*

Abstract

This article reviews studies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aiwan from 1980 to 2020. In the first section, I discuss the decline in studying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aiwan through analyzing higher education curriculums and the topics of history dissertations. The heyday of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in Taiwan occurred during the 1980s, but from the 1990s onward, the field has undergone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second section, I explore the following trends related to studies within intellectual history: 1. the study of the thoughts and intellectual ethos of scholars during certain historical periods; 2. the adoption of social and cultural histories to examine intellectual history; 3. conceptual history, history of Chinese lexicon,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4. East Asian Neo-Confucianism and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Finally, I also introduce the important works of these fields, which represent the key developments and transformations in the study of Chinese intellectual history during the past four decades.

Keywords: intellectual history, cultural history, conceptual history, East Asian Neo-Confucianism, global intellectual history

* Miaw-fen Lu, Research Fellow, Institute of Modern History, Academia Sinica.